

顾诵芬：

# 蓝天寄深情 为国铸「战鹰」



1984年6月12日,歼8Ⅱ飞机首飞成功,总设计师顾诵芬(右二)等在首飞现场。  
新华社发

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带着这颗种子,从青葱年少到意气风发,顾诵芬毅然前往冰雪飘飘的北国。

1951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时刻,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启了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灵魂。我国开始飞机设计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手段完全空白。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他潜心学习研究国外资料,最终提出了亚音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和气动特性工程计算方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的设计工作。

**拼命解决设计难题：  
三上蓝天**

**给飞机“找毛病”**  
像静水深流,顾诵芬儒雅而沉静。同事和朋友们说他博闻强记,像个“书痴”。年逾九旬,他依然坚持学习,总给大家说:“我现在能做的也就是看一点书,推荐给有关的同志,有时也翻译一些资料,尽可能给年轻人一些帮助。”

似大象无形,顾诵芬谦虚而务实。在工作中,他跑遍了设计室各专业组、各试验室,试验工厂模型加工车间。沈飞部装、总装厂房,试飞站都有顾诵芬的身影,他与许多老工人都成了好朋友。

如利剑出鞘,顾诵芬执着而无畏。为解决歼8飞机跨音速振动的问题,他曾乘坐歼教6飞机升空观察歼8飞机的飞行流谱,两架飞机飞行时距离保持在5米左右甚至更近……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歼8飞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首型高空高速歼击机。顾诵芬作为副总设计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一项项难题、一次次试验……时光在顾诵芬身上仿佛是静止的,无论什么时期、什么困难,他都能淡然面对;但时光在他这里又是沸腾的,为了心中的理想和信念,无畏前行。

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首飞。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

强烈振动,这让所有参研人员都悬起了一颗心。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顾诵芬决定亲自乘坐歼教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机后面观察振动情况!

据当时驾驶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顾总那会儿已年近半百,却丝毫不顾高速飞行对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所有在场的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经过三次蓝天之上的近距离观察,顾诵芬和团队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通过后期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

**追梦蓝天寄深情：  
心无旁骛  
坚持干好一件事**

顾诵芬的办公室像一座“书的森林”,而他总能记得每一本书的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

在家人眼中,他无疑是一位“工作狂”;在同事和学生眼中,他又是个总能济困解危的“大先生”。

如今的顾诵芬,身体患有疾病,经过两次手术的折磨,仍不断思考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未来。

“从成立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开始,中国的航空工业就注定要走上自主创新这条路。”航空工业沈阳所首席专家、多型飞机总设计师王永庆这样评价顾诵芬指明的方向。

“顾老教会我们的,不仅是飞机的设计和创新,更让我们学会了无论何时都不要在意质疑,要始终坚持真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金子终究会发光。”作为顾诵芬的学生,如今自己也成了院士的歼8舰载机总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院长孙聪深情回忆起和顾院士的交往,心中满是感怀。

一生,顾诵芬就坚持干好研制飞机这一件事。“顾诵芬参加工作之时,恰逢新中国航空工业创立,他是我国航空工业近70年进程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他始终践行着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践行着航空报国精神,担当着航空强国使命,他把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的蓝天,献给了党。”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周国强说。

90多岁的人生,70年的科研生涯,顾诵芬的经历,见证着新中国航空工业从创立到强大的70载春秋。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2003年1月7日,王大中院士(右二)等人在高温气冷堆总控室听取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院长张作义教授(右一)的汇报。  
新华社发

在先进核能技术研发的征程中,王大中一干就是几十年。

在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际著名核能科学家、教育家王大中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王大中带领研究团队走出了我国以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核能技术的成功之路。同时,王大中也是该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清华大学原校长,对我国人才培养做出突出贡献。

**一生为核  
一生为国**

20世纪60年代,北京昌平南口燕山脚下聚集了一批年轻人。

在当时起点低、基础薄弱的困难条件下,这支青年团队满怀报国热情地喊出“用我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能事业的春天”的豪迈口号。就在1964年,这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建造、运行的屏蔽试验反应堆。

这其中就有王大中的身影。

当时从北京市区到科研场地要一天的时间,王大中同事们都把家安在了山脚下。作为我国第一批核反应堆专业的学生,王大中从反应堆物理设计,到反应堆热工水力设计,再到零功率反应堆物理实验,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奋斗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和战略思维的带头人。

科研如登山,永远有过不去的坎儿,也有必须要迈过的深渊。1979年,世界核能事业陷入低谷。王大中意识到,安全性是核能发展的生命线,如何破解这个难题?王大中带领团队瞄准这一重大难题,坚持发展固有安全的核反应堆。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实验堆、再到示范工程建设,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破解了世界难题,走出从跟跑、并跑到领先世界的自主创新之路。

王大中说:“克服困需要有悟性、勇气和韧性。悟性,指的是一种分析问题的能力。勇气,就是要敢于尝试,敢于选择科技领域的无人区。韧性,就是在遇到挫折的时候,有百折不挠的劲头。”

**核安全从“学世界”  
到“看中国”**

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张作义现在的办公室正是当年王

大中工作过的地方,房间里还陈列着当年王大中去国外调研的照片。

“对于一些关键技术,当时有人建议从其他国家购买相关技术文档,王大中团队经过科学调研,下定决心要在充分了解世界最前沿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研发。”张作义说,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从此开放条件下的自主创新成为团队的研究主线。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能源危机的阴霾仍未散去,国内社会发展迫切需要充足的能源供应。王大中敏锐地认识到核能的重要意义,积极投身到低温核供热堆的研究工作中。

从1985年开始,王大中主持低温核供热堆研究。他带领团队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进行论证,其间专程带队去欧洲考察,最后确定壳式一体化自然循环水冷堆方案,并计划先建设一座5兆瓦低温核供热实验堆。

有国际核专家评价此工程:这不仅是世界核供热反应堆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在解决污染问题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目标定位上要‘跳起来摘果子’,如果目标过高或过低,只能无功而返或达不到预期成果;‘跳起来摘得着’才是适度的高标准。设法使自己跳得高一些,这样才能实现勇于创新与务实求真的结合。”王大中这样总结项目经验。

这只是第一“跳”,王大中还要继续“跳”,还要继续“摘更大更好的果子”。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世界核能发展转入低谷,核安全问题更加凸显。但此时,王大中并没有动摇。他坚信,只要解决了安全性问题,核能还是有广阔前景的,而全新的、具有固有安全性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将会成为核能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何建坤这样评价:“王大中先生几十年坚持一个方向冲锋,从未动摇,这种坚韧也是其科学家精神的体现。”

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他带领团队开始了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研发。该项目于2003年并网发电,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10兆瓦高温堆成功之后,王大中提出要实现在实验反应堆向工业规模原型堆的跨越。他多方奔走,指导团队积极探索产学研合作之路,使多项先进核能创新成果获得了重大应用。

王大中：

# 见险峰而越 固强国之基

**甘为人梯  
百年树人**

几十年来,王大中带出了一个能打硬仗的团队,也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5年,王大中从老所长吕应中手里接过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所长的担子,继续坚持团队攻关道路。

他的目标是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必须组织大团队集体作战。他与同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即使在核能事业陷入低谷的形势下也坚持了下来,带出了一支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能够承担从理论研究到重大工程项目、充满活力的创新团队。

如果说从事核反应堆专业是青年时期王大中的主动选择,那么1994年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则是他开启的另一段精彩的人生历程。

“王大中老师不仅是我的学术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教授石磊说。

在石磊撰写学位论文期间,王大中几乎对每章、每节、每段都有详细的指导。“几乎细节到每个表述与标点,王老师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学风让我终身受益。”

面向21世纪,王大中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提出“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思路,制定“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确立了“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完成了综合性学科布局,为清华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